

解放初期港口乡支前剿匪恢复生产杂忆

□李浩

港口乡解放前属中山县一区，共有 3600 余户，人口 1.5 万余人。是个典型的大沙田区，土地面积围田约 5.5 万亩，潮田约 1.5 万亩，合计 69945 亩，盛产粮食，少数甘蔗水果。河道纵横，交通便利，是中山广州的通航要道。居民以出卖劳动力或佃耕少量土地的贫雇农为主，生活极端贫困。但由于地理位置重要，一向成为国民党反动派头子袁带所部的第二支队吴金（烧猪金）和第三支队梁自带（自带仔）盘踞的土匪窝，他们残酷剥削农民，大量走私谷米，成为当地的土皇帝。

解放后，为了支援南下大军，中山县成立了支前指挥部，区镇成立支前指挥所。一区指挥所由黄敏元同志任主任，我任副主任。分工我带工作队进驻港口，开展工作。我们工作队共 10 余人，于 1949 年 11 月上旬进驻港口，接收了国民党的乡公所和自卫队武装，开展工作。

支前喋血

中山解放后，国民党的潜伏匪特活动还很猖獗。有一名运禾秆的解放军就被暗杀。记得在 1950 年农历年初七，我们刚从石岐回到港口，当天派到西街工作的 4 名同志，就遭到暗藏匪特的袭击。新青团员黄凤兰光荣负伤，她当时只有 17 岁，是一区革命老区长洲乡烈士家属、中山独立团十三连的一位女战士，在和土匪枪战中身中 5 枪，从地面掉到涌边的一只小艇上，幸而所中枪弹是土制左轮，威力不大，不曾致命。当时我们正在东街工作队开会，闻讯立即渡河赶到现场，把黄凤兰送到石岐抢救。

现场搜索，发现地面有一线血迹，由现场一直通到村外，显然是土匪在枪战中有人受伤留下的痕迹。我们就跟着血迹追寻六七里，到了一个果围，名廖坤元围（廖是梁自带的契仔），血迹就不见了，果围里的人已逃走一空。搜索全围，就在水河埗头发现了浮出血红的水色，用竹杆打捞，捞起了一条沾满血迹的长裤，受伤的土匪显然就藏在这里。在一个乱秆堆中，我们抄出了一个右腿膝头被枪弹打伤的匪徒。原来他在追击黄凤兰时，被伏在水棚下的工作队员梁深同志一枪打中了膝头，估计是他的同伙把他的伤口包扎起来，准备另行转移。此人很顽固，只承认名叫吴满有，30 岁，九区人，同伙一个不认。解往石岐，被判死刑，解回港口执行枪决。

受重伤的黄凤兰同志表现很好，一不怕痛，二不怕死，经过大力抢救，很快脱险。伤愈后又自动取消回乡休养假期，重新回到港口工作。她的英勇行为受到了上级党委和团委的表扬，被评为我县第一位光荣的模范团员。

由于深入发动群众，一些大地主私藏大量粮食抗拒筹粮的行动被揭露出来，特别是解放军的支持，杜绝了粮食走私出境的活动，我们的筹粮任务在 1950 年春耕之前，就已基本完成了。

恢复生产 退租反霸

春耕时节到了，县委发出生产度荒退租反霸的指示。当时由于恶霸地主纷纷逃亡，他们长期霸耕夺佃的大量土地丢荒下来，全乡有 4000 多亩，群众不敢开耕。仅梁自带长期霸耕的大雁十二顷围就有千余亩土地。当时珠江地委和珠江军分区设在中山，非常重视农村工作。杨康华同志选了近郊四个大乡港口、长洲、溪角、濠头，作为调查研究重点，指定工作队同志随时汇报。在一次汇报会上，我们把港口乡大量土地丢耕的情况汇报后，他非常重视，很快就组建了一个生产大队，由两广纵队的古兴同志任教导员，进驻大雁十二顷围进行春耕，明确规定土改时全部归还港口乡统一分配。这一措施对支持我们清匪反霸，恢复生产，非常

有力。

在这广阔的沙面驻扎着一支亦兵亦农的解放大军，对镇压匪特，稳定生产有着关键性意义。根据形势发展，县委、区委同意我们把其余的 2000 多亩丢耕土地，发给没有土地的贫苦渔民和贫民小贩开耕，保证谁种谁收，土改时再统一分配。群众热烈欢迎，并组织了农民协会和民兵队，协助工作队进行具体的工作。使全乡插秧工作按季节顺利完成，不丢荒一亩田。当时在石特南九一带还有一小撮匪特分子，进行散播反攻大陆谣言，威吓农民交开耕黑票，企图袭击工作队等活动。我们在群众紧密配合下，把这一小撮匪特分子 10 多名逮捕起来，搜出他们暗藏的反共抗俄救国青年团（简称“彩胜堂”）的番号和图章，其中两名经上级审判后解回港口执行枪决，其余宽大处理，交群众管制。原来这批反动分子就是 1950 年初袭击工作队黄凤兰等同志的匪徒。

胜利完成春耕插秧之后，又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广大农民的度荒问题。县委及时发出了生产度荒退租反霸的指示。港口乡较大的地主从来不住港口，我们就以农会为基础，组成退租小组，选出骨干，带领有关耕人佃户，组成退租队伍，每天清早，分头到地主家里，按照党的退租政策，和地主面对面进行说理斗争。由于工作做得细，工作进展很顺利，很快就取得了退租成果折合稻谷 40 多万斤，使全乡农民第一次解决了春荒困难，不饿死一个人。

特别值得回忆追述的就是通过退租，把已经逃亡的大地主大恶霸梁根抓回来了。梁根原来是一个偷鸡摸狗的小偷，青年时看上了农民郭美的妻子，黑夜扮成女人摸到郭美家里把他的妻子强奸了，还把郭美毒死，强占了郭美的妻子和遗孤，从此从小偷变成江洋大盗。20 世纪 30 年代初轰动全省的打劫“同兴渡”事件，就是他参与制造的。同兴渡是来往中山至广州的大型客轮，梁根纠合几名匪徒，把一枚水雷埋在港口白花头出海口处。“同兴渡”经过时触雷爆炸，炸死 100 余人，船上财物被掠一空。梁根从此成了港口土匪的太上皇，在港口、民众等地拥有大量土地。中山沦陷期间，他的儿子梁德还为日伪包收军粮。抓到了梁根，港口农民兴奋极了，“清算梁根的时候了！”在斗争梁根大会上，苦主郭华福（郭美的亲侄）捧着郭美的“神主牌”声泪俱下，控诉了梁根的罪行。当年目睹“同兴渡”被炸后的悲惨景况的群众，纷纷起来控诉，梁根被依法判处了死刑。但他的儿子梁德顽抗到底，拒不交出私藏武器。后来经过说服教育，把郭美的遗孤郭十五争取过来，供出梁根埋在石岐家里的一批武器。

防洪抢险确保不崩一个围

度过春荒之后，又到了防洪季节。解放前，港口全乡围堤长年失修，仅 1948 年，因崩围（即缺堤）失收面积就达到万余亩，“马大丰，十年耕种九年空”成了家喻户晓的民谣。经过恢复生产，退租反霸等一系列斗争锻炼，港口农民觉悟有了很大提高，于是，着手建立了一个全乡的水利会，领导组织全乡防洪工作，主任就是治水能手、劳动模范苏和礼。由于港口没有联围，而大小围堤线加起来最少有六七十里，故暂时不能全面大修，只有抢修险段，确保汛期不崩围。

解放后的第一个春天风调雨顺，禾苗生长茂盛，群众修水利的积极性空前高涨。土工程师苏和礼走遍了大小围堤，根据险情，确定施工方案，写上竹签，插在险段。群众迅速行动起来，不到 10 天就把各围险段全部修好。墟镇的工商界也热情支持，捐出了大量杉竹麻袋等防洪器材。汛期到了，群众大清早就自带伙食，以救基队为单位，开赴防洪前线，采取固定守险与流动巡逻相结合的方法各就各位，严阵以待。整个汛期，只有缸瓦沙烂六顷小围崩了 1 个缺口，不到 1 个小时就修好了，没有造成损失，其余全乡大小围堤全部安全度汛。为了庆祝抗洪胜利，全乡举行了 1 次大游行，当晚还开了 1 个祝捷大会，群众站满了东街小学的大会堂。

然而，就在群众兴高采烈的时候，却埋藏了一个隐而未发的危机！

在抗洪祝捷后，我们几个同志分兵到公庙村驻点。不久，接到农民小组检举，该村有个恶霸二路地主林××，就在我们进驻的当天晚上，把暗藏的一批武器秘密转移。我们立即把林××逮捕起来，取出了机关枪 1 挺、步枪 10 余支和一堆子弹。他还供出了一个暗杀未遂的大阴谋：原来就在抗洪祝捷大会那天晚上，他亲手埋藏了一枚大型炸弹，埋在大会堂的北边墙角。幸而没有爆响，他就把炸弹丢进海里了。我们把他解到县上审讯，判处死刑，解回港口执行。

（选自《中山党史》2002 年第 3 期）

中山党史